

# 台灣歷史圖像的表層和內裏： 特就「流求」論

杜 正 勝\*

## 一、人人都有歷史圖像

「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的、類似於史書的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它的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有新的用意，「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所追求的真實歷史帶有保留的意味。

去年（2012）我給某教會學苑講授台灣史，學員都是富有人生社會經驗的成年人，開課之前要求他們寫出所認識的台灣史，並且說明知識的來源。看過問卷，我發現內容雖然頗為分歧，但大致有一些共同現象，一是大家多能按照時代先後序列記下他們所知道的台灣歷史，可見在人們的心目中，「歷史」是由一系列的圖像構成的，不會

\* 中央研究院院士、長榮大學講座教授

只是單一的圖像而已。

一連串的歷史圖像，即使專家也因取捨而有所不同，何況學員都沒有受過史學專業訓練，敘述起來當然「七零八落」，但也有不少共通點，譬如早期多會提到荷蘭、西班牙和鄭成功，時間最久的清帝國往往只知道朱一貴、林爽文與劉銘傳，日治時期則是開頭的馬關條約以及結束的二次大戰，接著便是中國國民黨兩蔣政權。這些片斷知識構成他們所認知的「台灣史」，其中有人物，也有事件，應該是他們腦海中最鮮明的圖像，才會在有限的篇幅被寫下來。

學員的台灣史圖像，限於個別的敘述能力，詳略不同；他們對我第二個問題的回答，知識來源大多得自學校教科書以及一般的閱讀，也可以說是社會當今最流行的故事。如果三、四十年前來作問卷，早期台灣歷史的圖像，荷蘭人之出場只是作為鄭成功的配角吧；而所謂荷西時期，一般不會把它當作台灣史的一個「正統」的斷代——當然，在那個時代也不會有獨立存在的台灣史。

學員年紀差距相當廣，多集中在五十和六十這兩個年齡層，七十歲這層也占一定的份量，尚有高齡八十開外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而三、四十歲者則少數幾位而已。放在二戰結束以來的歷史，這批學員大多是戒嚴時期國民黨教育的產物，九十年代台灣自由化、民主化時，他們已經完成學校正規教育，即使這個教會的教友具有比較鮮明的台灣意識，但他們對台灣史的認識多可以在國民黨版的歷史建構找到根源。

不過這些問卷中有一份特別醒目，雖然也從葡萄牙人的 Ilha Formosa 開端，絕大部分內容則放在日治時期，應該可以理解作這位

學員的台灣歷史圖像以日本統治最鮮明。他除了講述大家經常提到的後藤新平，毋寧更強調安東貞美和明石元二郎這兩位總督，以及他們的民政長官下村宏，他們興建的桃園埤圳與規劃的烏山頭水庫大大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我查核學員資料，發現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估計日本退出台灣時已完成中學校教育了；他接受的歷史，包括以後透過日文所獲得的知識，顯然與六、七十歲以下者不同。如果把他和 1997 年批判國中「認識台灣」教本「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統派人士對比，顯見人人心目中的「歷史」或「歷史圖像」和他們成長過程所受的教育以及個人的政治選擇頗有關係。

## 二、介於真實和想像之間的「歷史」

個人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一般多會說是讀書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聽的，甚至從電影、戲劇看來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使我們相信，於是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給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圖像」。

上述的模式應該是通相，台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除非你是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才有所不同，因為你是建構歷史供給一般讀者的人。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的，他在成長過程必

然經過以上的歷程，同樣也受時間、空間之情境和主觀、客觀之條件的制約，只因為他學得一些歷史研究的專業技術，遂能建構「歷史」，提供給人他的「歷史圖像」罷了。嚴格說這是他講的「歷史」，不一定等於人們期待的真實歷史。

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不是憑空捏造的，它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真實或偽造、有意或無意、周全或偏頗等兩難問題，歷史學家要有本事予以分辨、判斷、過濾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都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都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絕不可少。

不過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機遇性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基礎是相當脆弱的。且不說一般讀者多要求聽一個完整的故事，不想讀那些枝節的考證；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完成的作品。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的主觀性，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

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sup>1</sup>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耐性不斷探索歷史，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

<sup>1</sup>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1964, 1990), pp. 7-8, 其所引 Acton 的話見於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s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1907), pp. 10-12; Clark 見於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1957), pp. xxiv-xxv. 中譯參看：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0），頁 1-2。

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裏的歷史，在人世間便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然而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中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對史料自然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一般人閱讀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俗諺有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似乎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而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是非了？然而天下之理路固有不同，是非容可存異，但知識的「真」是無法打折扣的。歷史的探索，任何研究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過程」，不可能獲得「定論歷史」(ultimate history)，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無法擁有最後的真實歷史。<sup>2</sup>即使如此，並不表示「歷史」只是虛幻的臆說；反而讓我們體會到世人

<sup>2</sup> 上述 Clark 概括其前輩的史學說：They consider that knowledge of the past has come down through one or more human minds, has been ‘processed’ by them, and therefore cannot consist of elemental and impersonal atoms which nothing can alter.他的觀點與本文這裡的看法有相通之處。

認知的「歷史」，在表象之下，內裏還藏著非常複雜的成分和曲折的過程。

作者或讀者如何面對此一不完美的情境呢？史學宏論不一定能饜足我心，倒是翻閱閒書時，無意中讀到二十世紀最具影響的義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記述前輩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 1906-1977）編導的經驗說：

他（羅氏）對事實永遠那麼認真、清澈、熱情，毫不猶豫地選定了一個介於冷漠和亦步亦趨之間的特立獨行且難以捉摸的觀察點，讓自己得以捕捉並界定所有的事實，能同時看到事物的內與外，記錄下它周遭的氛圍，揭示其晦澀、神秘和玄妙。<sup>3</sup>

羅塞里尼認真追求事實，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揭示它的奧秘之處。歷史家不能放棄對事實的追求，觀察歷史也要看到表層和內裏，羅氏編導電影的態度和技藝（眼神）給歷史學家帶來一定的啓示作用。

### 三、台灣史的「第一」問題：「流求」在哪裏？

所謂「第一」問題，既指台灣歷史開端必然碰到的問題，也是台灣史研究長年以來沒有定論，而仍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教育的難題——這就是傳統文獻的「流求」或「琉球」當今何處？是否即是台灣？

台灣歷史從那裏說起？不同學科憑藉的資料不同，給我們繪製的

<sup>3</sup> Federico Fellini 著，倪安宇譯，《虛構的筆記本：費里尼的塗鴉》（*Fare un Film : A Writing by Federico Fellini*）（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56。

「歷史圖像」亦異。考古學家指引我們去看大坌坑、卑南等文化遺跡，的確夠遙遠了；歷史學家有人叫我們看最近四百年，也有指向千餘年前的。由於採擇史料、解釋史料不同，形成的歷史圖像往往有如胡越。從十七世紀的荷蘭人和鄭成功，或是所謂更早的三國之吳與隋朝的入侵？台灣怎樣進入歷史舞台，怎樣被發現？怎樣尋求她的身分認定或主權歸屬？這些問題既屬於歷史的，同時也是現實的。不同的理解，不但發現台灣的歷史圖像不同，也牽動現代台灣人不同的政治神經。

儘管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古代史距離我們又那麼遙遠，但台灣史開篇遇到的「流求」問題和當今台灣人卻那麼貼近，所謂台灣的發現和主權歸屬，在我們這個政治分裂的社會，不同立場的人往往接受不同的歷史圖像而形成政治性的定見。概略言之，統派（或中國派）傾向於流求即是台灣，獨派（或本土派）則持相反的或存疑的態度。戒嚴時期教科書宣達的官方說法，毫無疑問屬於前者，九〇年代民主化後，尊重不同的學術解釋，教科書容有比較多樣的論述，不過教科書所憑藉的課綱仍然是爭議的焦點。歷史課綱原本容易淪為政治角力場，而 2008 年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以後，逐漸又有倒退返回戒嚴時期的趨勢；執政者遂千方百計設法修改課綱，想把《隋書》的流求確定為今日的台灣，以建立台灣自古就與中國所有繫連的歷史圖像。

其實台灣怎樣被發現而登入載記的，長期以來是一個謎，她的身分認定最近百餘年則爭論不休；不要說遙遠的西洋，即使只相隔一條海峽的古老文明中國，直到非常晚近，才對她有清楚的認識。考查今存的中國古地圖刻石，東、南海域的島嶼，有很明確的海南島，卻無台灣；較早雕板圖籍，在今日江、浙、閩、粵諸省的東方海面，則扶

桑、日本、琉球、倭奴、瀛州錯置。<sup>4</sup>所以清朝初年朝野都認為「台灣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始入版圖。」<sup>5</sup>是實際的歷史敘述，而非歌功頌德之虛言。

「台灣」或其音近的大員、台員、大灣等詞，見諸文獻已經晚至十七世紀，然而中國典籍從七世紀初的《隋書》起，卻不斷記載著東方海上有一個「流求國」，於是遂有人認定歷史上的「流求」就是近現代的台灣，這就是所謂的「台灣論」。

然而根據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日本學者和田清的考證，<sup>6</sup>十四世紀中期朱元璋建國之初，明朝帝國和琉球國建立邦交後，明人一致地認為琉球即是隋代的流求。而十七世紀以下，中國人移民台灣，中國政權統治台灣，對台灣原住民的歷史認識，或比諸古代傳說的葛天氏、無懷氏之民，甚至說是被蒙古所滅的金人遺裔，<sup>7</sup>卻不見有人去繫連

<sup>4</sup> 刻石如兩宋之際劉豫阜昌7年（1136）的「華夷圖」、南宋紹興12年（1142）的「禹跡圖」、南宋淳祐7年（1247）「地理圖」；雕板圖籍如北宋宣和3年（1121）的「東震旦地理圖」，「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參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97）。

<sup>5</sup> 劉良璧主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首〈聖謨〉，引雍正元年「諭從優議敘平臺官員」云：「上諭：台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聖略神威，取入版圖。」台灣文獻叢刊第74種，頁14-15。其他清人認為台灣自古不通中國之資料甚多，略參杜正勝，《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頁181-185。

<sup>6</sup> 參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14卷第4號（1924）。

<sup>7</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曰：「平地近番，不識不知，無求無欲，日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相傳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後面這節想像即他的〈土番竹枝詞〉所詠：「聞道金亡避元難，颶風吹到始謀居。」至於無懷、葛天這類中國古代傳說，清人亦多比附原住民，如高山〈甲子奉命赴臺清查官莊即事成詠〉云：「含哺民近無懷氏」；張湄〈北巡紀行〉曰：「懷葛今何遠，淳風此地多」；鄭霄〈番俗〉：「混沌初開似葛懷，人間甲子欠安排。」另外也有比作義皇上人的，齊體物〈臺灣雜詠〉：「疑是義皇上古民，野花長見四時春」；孫元衡〈秋日雜詩〉：「此是義皇上，文身似羽翰。」相對的，我們看不到清人將台灣原住民和《隋

《隋書》流求國的。換句話說，來台的士大夫沒有把「流求」和「台灣」等同起來。

將「流求」牽連到「台灣」者，近代學者推始於十九世紀七〇年代譯述《文獻通考·四裔考》琉球國的法國漢學家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德理文，1822-1892），《文獻通考》這則記述主要取材於《隋書》，他說古之所謂流求應該是介於福建和日本之間的一群島嶼的總稱，即今日琉球與台灣的合稱，<sup>8</sup>日本學界稱作「混同論」。德理文出自十九世紀法國著名漢學家 Stanislas Julien（儒蓮，1797?-1873）門下，接任儒蓮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中國及韃靼、滿洲諸語和文字」的講座，<sup>9</sup>可見在歐洲具有相當影響力，他的觀點被西方學者所繼承，如最早寫《臺灣島史》（*Geschichte Formosa*, 1897）的旅日德國歷史家 Ludwig Riess (1861-1928)，以及稍後的 E. V. Bretschneider 的 *Mediaeval Researches* (1910), Friedrich Hirth 與 W. W. Rockhill 合著的 *Chau Ju-Kua* (《趙汝适》) (1912)，都持此一主張。「混同論」的日本學者，首推中馬庚 (1870-1932)，他廣搜史料，論述台灣與琉球二地皆有符合中、日傳統史籍的證據，<sup>10</sup>

---

書》的流求國聯繫一起。只要一讀勞之辨 (1639-1714) 〈海中島〉即知，詩云：「海中島，各一方，耳無帝，目無王。古若茲，況漢唐。」完全沒有被征服過的痕迹。上引諸詩俱見於全台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第壹、貳、叁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

<sup>8</sup>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Sur Formose et sur les îles appelées en Chinois Lieou-Kieou," *Journal Asiatique*, No.6, Août-Septembre ,1874.

<sup>9</sup> 參秋山謙藏，〈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関する第二論〉，《歷史地理》第 58 卷第 6 號 (1931)。

<sup>10</sup> 中馬庚，〈臺灣と琉球との混同に付て〉，《史學雜誌》第 8 編第 11、12 號 (1897)。

寫《臺灣志》（1902）的伊能嘉矩（1867-1925）從之。而有「沖繩學之父」尊稱的琉球民俗學泰斗伊波普猷（1876-1947）則認為《隋書》兩次遠征流求，前一次是台灣，後一次是琉球。<sup>11</sup>以上都屬於台灣琉球諸島總稱說的支持者。

至於《隋書》流求單指台灣一地者，首見於荷蘭漢學家 Gustave Schlegel（希格勒，1840-1903）對德理文的挑戰，<sup>12</sup>謂之「台灣論」，在日本近現代史學算是新說。日本老輩學者市村瓊次郎（1864-1947）認為流求和更早的夷州都指台灣，<sup>13</sup>和田清（1890-1963）申述市村與希格勒之說，引發一系列的論戰。<sup>14</sup>校注《島夷誌略》的藤田豐八（1869-1929）、撰寫《臺灣文化誌》（1928）的伊能嘉矩、白鳥庫吉（1865-1942）和曾我部靜雄（1901-1991）都屬於台灣論者；<sup>15</sup>而幣原坦（1870-1953）也從琉球論轉為台灣論。<sup>16</sup>至於台灣方面，深習日本學術傳統的曹永和（1920-）在六〇年代探討台灣早期開發，則是

<sup>11</sup> 伊波普猷，〈隋書の流求に就いて疑問〉，《東洋學報》第 16 卷第 2 號（1927）。

<sup>12</sup> Gustave Schlegel,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t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琉球國, le Pays de Leou-Kieou”,《通報》*T'oung Pao*, Vol. VI, 1895. 希格勒著，馮承鈞譯，〈古琉球國考證〉，《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卷十九（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影印 1928 年版）。

<sup>13</sup> 市村瓊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 8 卷第 1 號（1918）。

<sup>14</sup>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同氏，〈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ついて〉，《歷史地理》第 57 卷第 3 號（1931）。關於各派重要論文目錄參：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台中：私立東海大學，1965），頁 286-287。

<sup>15</sup> 白鳥庫吉，〈夷洲及び亶洲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 40 編第 12 號（1929）「第百十六回東洋史談話會記事」；同氏〈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民族學研究》第 1 卷第 4 號（1935 年 10 月）。曾我部靜雄，〈所謂隋代流求に就ての異聞二つ〉，《歷史と地理》第 29 卷第 1 號（1932）。

<sup>16</sup> 幣原坦，〈琉球・台灣混同論爭の批判〉，《南方土俗》第 1 卷第 3 期（1931），收入《南方文化の建設へ》第四章（東京：富山房，1938）。

明代之前流求（琉球）即台灣論的代表。<sup>17</sup>

第三種說法是《隋書》流求和其後同音的相關資料都指令之沖繩的琉球，不包括台灣，即所謂「琉球論」。此論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新井白石（名君美，1657-1725）的《南島志》（1719），是日本傳統史學的通識；至於近現代則以秋山謙藏（1903-1978）主張最力，<sup>18</sup>在和田清發表台灣論之後兩年，針鋒相對提出論難。喜田貞吉（1871-1939）附合之。<sup>19</sup>法國的日本史學家 M. C. Haguenauer 從民俗學之論述，支持秋山的琉球說。<sup>20</sup>他斷然反對和田清，頂多讓步到十五世紀以前的「流求」比十五世紀以後具有遠為廣泛的義涵而已，<sup>21</sup>勉強屬於混同論。

中國學者對於掀騰日本史學界的「流求」問題多沉默無語，只有留學日本、戰後來台任教於東海大學的梁嘉彬（1910-1995）最突出，

<sup>17</sup>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第3期（1963年4月），收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1997）。

<sup>18</sup> 秋山謙藏，〈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歷史地理》第54卷第2號（1929）；另外秋山氏著，楊雲萍譯，〈中國使節之琉球訪問與隋書流求傳〉一文，原作和中譯我都未見，係據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藏楊氏譯本「譯者附記」手稿，「附記」提到秋山兩本專書《日支交涉及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9）及《東亞交涉史論》（東京：第一書房，1944），唯只後者〈臺灣島發見〉涉及本文的主題，基本上是針對台灣論研究史的回顧而已，可能即是下文會提到的〈流求即臺灣說成立的過程〉。

<sup>19</sup> 喜田貞吉，〈隋書の流求傳に就いて〉，《歷史地理》第54卷第3號（1929）。

<sup>20</sup> M. C. Haguenauer, "I. Le Lieou-k'ieou kao du Sonei chou était-il Formose?" *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Série Francaise, Tome II, No. 3-4 (1930)；此文未見，據白鳥庫吉上引文敘述。

<sup>21</sup> アグノエル（按即 M. C. Haguenauer），〈隋書の流求を臺灣に比定せんとする一試案に対する批判〉，《歷史地理》第58卷第5號（1931）。

自四〇年代後期以後，發表一系列論述，<sup>22</sup>畢生精力盡瘁於斯。

中國傳統文獻關於「流求」及其同音異寫的「琉球」、「瑠求」，以及相關的雞籠山，半世紀前經由吳幅員、曹永和二氏蒐羅彙集成《流求與鷄籠山》一書，收入「台灣文獻叢刊」，扣除年代甚晚的《新元史》，總計三十六種。但宋代以前的資訊來源，卻相當單一，大抵皆出自《隋書》。

「流求國」記事始於唐修《隋書·東夷列傳》，大約同時撰修的《北史》，和宋代的《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以及鄭樵(1104-1162)《通志》與元修《宋史》，大多沿襲《隋書》的知識。南宋趙汝适(1170-1231)《諸蕃志》增附所謂附近的毗舍耶和三嶼兩個地方，《宋史》「流求國」條反而詳於毗舍耶而略於流求。另一種「琉球」的寫法，一般通行於明清近代，但早在杜佑(735-812)的《通典》就出現過，寫法雖異於《隋書》，內容則相同。元代以後的「琉球」和以前的「流求」，語音雖近，但它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面貌卻有明顯的文明與野蠻之差別。

歷史研究方法以甄別史料為基石，甄別原則又以直接史料的可信度高於間接史料。親履其地，親睹其事，親聞其言者的紀錄都屬於直接史料，上述諸書的流求記事大概只有《隋書》根據直接史料（國家檔案）寫作「流求國傳」，其他諸書基本上多是抄來的。

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四裔考》即是這種文抄公的範

<sup>22</sup>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梁氏後有續作，見〈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大陸雜誌》第45卷第6期（1972年12月）及〈宋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國考證：兼考宋前、宋後琉球及臺灣澎湖諸島〉，《大陸雜誌》第44卷第1期（1972年1月）。

本，「琉球」條首述方位，除把唐宋記載的「建安郡之東」改為「泉州之東」外，又拉當時已經知道的澎湖來定位，但內容則完全沿用《隋書》的「流求國」，似乎元之琉球即是隋之流求了。不過稍後的汪大淵（約 1308-？）《島夷誌略》（1349，亦稱《島夷志》）則有實地考察經驗，他的琉球便和馬端臨的琉球，亦即隋之流求，截然不同。

生長於國際港都泉州的汪大淵，「少負奇氣，為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吳鑒《島夷志·序》）大淵〈後序〉也說：他「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域，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可見《島夷誌略》得自作者親身見聞，汪氏以琉球作為海外諸國之始，開篇就說：

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峙。  
其峙山極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  
夜半，則望暘谷之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sup>23</sup>

這四座山名是音譯還是意譯，或兼而有之，看日出的大峙山距離澎湖甚近，顯然不是沖繩，但翠麓（麗？）、重曼又另當別論。<sup>24</sup>顯然汪大淵是登上「琉球」的，不比馬端臨只坐在書房而已。中國的流

<sup>23</sup> 汪大淵，《島夷誌略》（台北：學生書局影印，光緒十八年順德龍氏知服齋刊），「琉球」。

<sup>24</sup> 屬於琉球論的新井白石，其《南島志》卷一「地理」考證音轉云：「沖繩島，即中山國也，……王府在西南，曰首里，蓋古翠麗（麓？）山地，今作首里，方音之轉也。（注：翠麗山，見《星槎勝覽》）」。又云：「八重山島，石垣、入表二島之地，總稱以為八重山，國史稱信覺，」（注：見《續日本書紀》，《星槎勝覽》稱重曼山，蓋皆謂此石垣，乃是信覺之轉耳。新井氏以為翠麗即首里，重曼（石垣）即信覺，皆沖繩之地。

求或琉球文獻，自唐到元，親履其地者恐怕只有汪大淵一人。明朝從初期開始因為有邦交，「琉球國」的記事就明確化了，不過同時的費信（1388-？）雖然也是航海家，四次下西洋，卻沒到過東洋，所著《星槎勝覽》後集的「琉球國」便採輯《島夷誌略》，並且加了一些捕風捉影的傳聞。<sup>25</sup>

除汪大淵外，明朝以前中國官方到過流求或琉球，只隋、元兩朝，隋有三次，元有兩次（《元史》寫作「瑠求」），其他的紀錄都是輾轉抄襲，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從明初洪武 5 年（1372），遣使招琉球國入貢，今之沖繩才和中國政府開始打交道。這個琉球國分中山、山南、山北三國，已有相當的衣冠文明，據洪武 23 年（1390）使節團通事私帶的乳香、胡椒來看，<sup>26</sup>與南洋的貿易已相當頻繁。一有邦交，貴族子弟留學中國，快速華化，和《隋書》以下流求國的原始社會情狀截然不同。然而明代關於琉球的記載，官書如《大明一統志·外夷》，民書如《潛確居類書·區宇部·東南夷》多將前此史書所記的流求國，坐實於接受冊封之琉球國。《武備志·占度載》亦視明代琉球為隋之流求，而其文化描述可能採擷使臣的報告；《西洋朝貢典錄》還摻入《島夷誌略》及《星槎勝覽》增益的部分。

晚到清初康熙年間，史臣編寫《明史稿》，截斷眾流，琉球歷史

<sup>25</sup> 《島夷誌略》「以花布為衫」到《星槎勝覽》則增益為「以花印布大袖衫連褲穿之，」平添許多沒有憑據的文化成分，而費氏所謂「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效唐體，」恐怕想像成分多些。

<sup>26</sup> 《明史稿》卷 197〈外國四〉「琉球」條云：「二十三年中山來貢，其通事私攜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為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

只上溯到元代，宋朝以前種種流求或琉球的記載都割捨不論；另外取材於《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的「雞籠 淡水」條，在其〈外國列傳〉置「雞籠山」一條，講台灣史。琉球和台灣不再混淆，為乾隆初定稿的《明史》所繼承，成為爾後標準的歷史圖像。

#### 四、既真實又縹渺的流求國

現實看到的琉球國（沖繩）暫且不論，至於那個縹渺的流求國，我們不妨從後世多種拷貝帶所根據的母帶《隋書》檢查起。

《隋書》記錄「流求」有三處，主要在卷八十一〈東夷列傳〉，其次是卷六十四〈陳稜列傳〉，最簡略的是卷三〈煬帝紀上〉，只有一條。隋政府會和流求國產生瓜葛，據〈東夷列傳〉「流求國」，起因於大業3年（607），好大喜功的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是純粹出於好奇，或是為著擴張國威？茲不能明。當時海軍裏有一位名叫何蠻的人，「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就把平昔所「見」向朱寬報告了。隋帝國的海岸線幾乎等同今日中國，何蠻這個水兵駐紮何處，史書無說，東望所見依希之島是那裏，便無從推斷。不過《隋書》說，朱寬「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茫茫大海，如何到法，歷時多久，史書都沒有交待，只說言語不通，於是「掠一人而返。」

勞師動眾，不知航行多少海浬，竟然只劫掠到一個俘虜就回來！惡名昭彰的隋煬帝對朱寬特別寬容嗎？不過唐人張鷟《朝野僉載》的記載和官修正史不同，他說「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原註：即後流虬）

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太平廣記》卷 482）無論如何，千餘口總比一人合理吧，並且掠奪流求國特產，有細白的木皮布和色如真金、文如美錦、嗅賽沉檀香的金荆榴木。

第二年（608）再派他帶兵去安撫流求國人。流求真倔強，硬是不從，於是「寬取其布甲而還。」可能因為皇上交待「慰撫之」，朱寬不敢再無端綁架或俘獲流求人了，這次則帶回「布甲」呈獻給皇帝，證明他的確到了目的地。布甲當是胸甲之類的東西，適逢「此時倭國使臣來朝。」隋煬帝讓倭使鑑定，回報說：「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這位倭使據日本資料，可能是小野妹子。

倭國在日本九州，其君自稱是「日出處天子」，而稱隋帝為「日沒處天子」，<sup>27</sup>隋倭平等外交，說倭使「來朝」，當然是中國史臣給自己臉上貼金，這是題外話，按下不表。不過倭國使臣倒提供一點新知識，朱寬去的所謂「流求」，其人穿戴的胸甲是夷邪久人用的衣物，流求即使不是夷邪久，兩國當具有密切的關係。根據幣原坦的研究，夷邪久即沖繩群島的屋久島，但伊能嘉矩則以為是南島的總稱。<sup>28</sup>

再過兩年，大業 6 年（610），隋煬帝第三次派兵進入流求國。這次可不同，大兵壓境，真打起來。原因史書仍然空白，至少我們可以確認，遙遠的流求國既不可能侵略中國，也沒有來由得罪煬帝，但大

<sup>27</sup> 《隋書·東夷列傳》倭國條：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

<sup>28</sup> 夷邪久（イヤク），《日本書紀》作「掖久（ヤク）」，《大日本地名辭書》曰：「掖久寫作夷耶（邪）久，因為ヤ的發音含有イ之故。」《日本書紀》天武天皇紀白鳳 11 年（683）七月：「多禰（たネ）人、掖久人、阿麻彌（アマミ）人，賜祿各有差。」幣原坦云，「多禰即今種子島，掖久、屋久島，阿麻彌、大島。」見《南島沿革史論》（東京：富山房，1900），頁 9。伊能嘉矩說見《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頁 14。

隋皇帝說打就打了。武貴郎將陳稜統帥，朝請大夫張鎮州輔佐，〈東夷傳〉云：「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陳稜傳〉云：稜與「張鎮周（州？）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隋朝的義安當今廣東潮州，自潮汕一帶出發，往那個方向去，史書缺載，航行一個多月的地方會是哪裏？東陽在今浙江金華，萬餘人是一支龐大的軍隊，糧草補給不易，既然三、四年前兩度到過流求，不論流求是台灣或沖繩，東陽兵儘可以從浙江、福建許多港口出海，何必跋千山，涉萬水到潮州，再從汕頭出海攻台灣或沖繩？

《隋書》的記述令人懷疑，陳稜的軍隊會不會航行到台灣和沖繩之外的第三地？除徵兵之地、出航港口和目的地三點間的不合理外，時間與航行節令也矛盾。《隋書·煬帝紀上》記陳稜、張鎮州擊破流求的日期是二月乙巳，二月吹東北季風，隋的水師不可能逆風而航，所以過去有人便把這日子作為凱旋，出師則在前一年。即使這樣還是兜不攏，因為自陰曆九月就開始刮東北季風，台灣地方志多謂「九月北風初烈。」陳稜百萬雄師如何在海上航行這麼久？如果要認定二月出航，往南才順風，那麼目的地非更在潮汕之南邊不可。〈東夷傳〉還說：「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其徵調中南半島的人去打沖繩或者台灣，徵兵是實，但目標也不太合理。最後上引《太平廣記》所錄《朝野僉載》如果可信（至少比《隋書》記第一次攻打流求國合理），張鷟說：「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為解脫之。」隋代的南海郡治在今廣州，朱寬班師回朝，目的地是揚州，豈有從今之沖繩或台灣南下廣州，再北上揚州之理？這麼說，隋代的流求國在南海中乎？因為我尚缺乏正面

的資料，不可能另外提出假說，在這個已經夠紛擾的老問題再增加混亂，其實過去流求的論述如果有強力證據，問題恐怕早已解決了。

回歸正史文獻。關於隋師航行路線，〈東夷傳〉只記最後幾天的里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隋朝的高華嶼、~~龜~~鼈嶼在哪裏？當代地誌史籍皆無線索可尋，近現代學者擬定的地點，北至沖繩，南到閩粵交界的南澳島，天差地別，全為呼應其流求所在而定，沒有確實根據。台灣史研究典範人物伊能嘉矩承襲藤田豐八《島夷誌略校注》之說，以為高華嶼近於澎湖西南的大嶼或西北的花嶼，~~龜~~鼈嶼即澎湖東北的奎壁嶼，譚其驥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淮南江表諸郡」也依此說標示。<sup>29</sup>伊能氏是台灣論者，但如果流求是台灣，在澎湖群島的奎壁和花嶼間二日航程，花嶼至台灣卻只一日，如何理解？同屬台灣論的和田清則將高華嶼安置在閩粵交界的南澳島，~~龜~~鼈嶼放在澎湖，流求指認在臺南平原。<sup>30</sup>另一方面的琉球論者，新井白石《南島志》卷上說高華嶼即今台灣，~~龜~~（原作龜）鼈嶼即沖繩的惠平屋島；梁嘉彬則分別認定為基隆外海的彭佳嶼和那霸港外的久米島。<sup>31</sup>可見《隋書》的高華、~~龜~~鼈和流求都沒有一個可以確證的基準點，即使有航行日數可估里程，也派不上用場；至於〈陳稜傳〉「月餘而至」這句話，論者多視而不見，試問

<sup>29</sup> 藤田豐八，《島夷誌略校注》「彭湖」條曰：「參高華嶼即今花嶼，~~龜~~鼈嶼即今奎壁嶼，屬彭湖。」叢書集成續編第 244 冊，影印雪堂叢刊。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 13；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頁 21-22。

<sup>30</sup>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

<sup>31</sup> 梁嘉彬，〈流求史論正謬〉，《國防月刊》第 4 期（1947），收入《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潮汕到台灣或沖繩，戰船須要航行一個多月，說得通嗎？

雖然軍行方向不明、路程矛盾，攻打流求國的兵源可能也有問題，不過，《隋書》的流求記事似非憑空想像，當有官方檔案依據，唯戰報虛實則不能令人無疑。〈陳稜傳〉和〈東夷傳〉都說俘虜男女數千人，〈煬帝紀〉則說：「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戰報不實固不足深論，我們關心的還是「流求」在哪裡？〈東夷傳〉提供兩個參考點，一是上文提過的夷邪久國，《日本書紀》的掖久（ヤク）既然在沖繩群島，主張台灣論的和田清武斷認定遭隋使「妄言」，卻也無法實指其地；同屬台灣論的伊能嘉矩則說是南島之總稱，不過地域廣闊，無法確指。伊能又說掖久與「流求」乃同一原名之轉訛，當然，依照後世日本人的用語，九州以南的海島都稱作「南島」，琉球（沖繩）群島也包括在內；<sup>32</sup>但這一來，伊能不又成爲台琉混同論了嗎？

「流求」的另外一個參考點是岷崙，〈東夷傳〉云：「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岷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岷崙乃南洋之一島，據樊綽《蠻書》，和婆羅門、波斯、闍婆（今爪哇）、渤泥（今婆羅洲）一列相連，此「波斯」即是馬來波斯（Malayan Po-Se），不是伊朗波斯（Iranian Po-Se）。<sup>33</sup>所以岷崙當在南洋的區域內，伊能認爲土人自稱 Pulo Konnon，當即《新唐書·地理志》所謂的「軍突弄山」，不必坐實到中南半島東南的海島 Pulo Condor 上。<sup>34</sup>

<sup>32</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 14、21。

<sup>33</sup>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 pp. 468-470；杜正勝譯，《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5），頁 336-337。

<sup>34</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 14-15。

其人馬來種，中國中古時代有所謂的「昆崙奴」即是，屬於廣大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就語言溝通來說，流求國人的確比較近台灣原住民而遠於琉球（沖繩）。但我們不要忘記在南島語族中，台灣原住民是與昆崙人講話能通的最北島嶼，這點對琉球論者構成一個極大的致命傷。

## 五、歷史語言方法的背後

批判史學首重史料之收集，史料的考信，而語言學（philology）分析和民族學比參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流求」研究史可以看到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此一學派的風尚。

《隋書》〈東夷傳〉和〈陳稜傳〉保留幾個流求語的音譯語料，〈陳稜傳〉謂「其主歡斯渴刺兜」、「其子島槌」、「小王歡斯老模」，而〈東夷傳〉云「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可見史臣的看法，「歡斯」是姓氏，「渴刺兜」、「島槌」、「老模」是人名；地名則有「波羅檀（洞）」、「低沒檀（洞）」，「鬥鏤」是樹名；還有表示身分頭銜的王，稱「可老羊」，王妻「多拔茶」，村莊首腦「烏了（帥）」。這十個語詞是當今僅存的流求語，討論流求族屬的重要資料，運用語言分析方法，連帶也是解答流求所在比較「客觀」的憑藉。

關於這幾個語詞的性質，近現代學者的理解不同，《隋書》所謂姓名、稱謂不一定正確；而表示地名的波羅檀洞、低沒檀洞，和表示職官之「烏了帥」，可能都是音義兼譯的名詞。此外也可能牽涉傳寫訛誤的問題，《隋書》的烏了帥，《文獻通考》作「烏了帥」，可能傳

抄之異，而「島槌」，有人推測當作「烏槌」。學者研討的基礎資料竟然這麼脆弱，何況語言學方法人各異說，未臻精準，仍不免主觀性的選擇，我們遂發現琉球論和台灣論這兩大陣營對這些語詞的解釋竟如胡越之懸隔，由此而建構的歷史圖像當然也就南轅北轍了。

十八世紀新井白石首先批判《隋書》的流求語解讀，《南島志》卷上「世系」駁斥《隋書》以歡斯爲王姓之不妥當說，歡斯「即君長之稱，後稱曰按司，曰王子，皆是古遺言也。」後世沖繩語稱王子的「按司」（あち，或あんじ），即古流求的「歡斯」，那麼，隋之流求國就是明代的琉球，今之沖繩了。琉球論者於是尋找能與《隋書》流求語詞相對應的沖繩語彙，多引用沖繩學之父伊波普猷的研究。<sup>35</sup>伊波普猷說，南島（按指琉球群島）中稱酋長爲「按司」者有沖繩本島、久米島、宮古島和大島等地。八重山沖繩語あんじ的同義詞チャラ或ガハラ，近似《隋書》「渴刺兜」的「渴刺」以及「可老羊」的「可老」；伊波推定「兜」與「羊」是助辭或助動辭，而「渴刺」與「可老」皆同義，都是稱號，不是人名。但主張台灣論的伊波氏在對音之餘，寧願認爲《隋書》流求人是沖繩移民台灣者，所以隋人攻台（流求），俘虜台民，得到あんじ之類的沖繩話。<sup>36</sup>另外主張琉球論最力的秋山謙藏則以「波羅檀」對應《溫州府志》的「波羅公」，其管下有密牙古（みやく），即宮古島也。<sup>37</sup>

<sup>35</sup> 梁嘉彬，〈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

<sup>36</sup> 伊波普猷，〈隋書の流求に就いて疑問〉；幣原坦的研究邏輯亦近似伊波，唯特別限於鄉嶠一地而已，見幣原坦，〈琉球・臺灣混同論争の批判〉。

<sup>37</sup> 明萬曆刊本《溫州府志》記載，元延祐4年（1317）永嘉海外發現漂流船，言語不通，尋訪通曉者詢問，得知「係海外婆羅公管下密牙古人民，凡六十餘

然而同樣使用語言學方法，白鳥庫吉則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他認為《隋書》所保留的流求語彙都屬於馬來語系，即今日所說的南島語系（Austronesian）。根據白鳥氏的研究，<sup>38</sup>歡斯即 Kandje，爪哇語的敬語；渴刺兜即馬來語 ratu，王也，所以稱流求國王「歡斯渴刺兜」（Kangdje Karatu），非姓歡斯名渴刺兜，而是「國王陛下」的意思！同樣「歡斯老模」是對次一等級有權力者的尊稱，不是姓名。馬來語和爪哇語稱父曰 rama，又轉而對王侯的敬稱，流求語「老模」（lao-mo）即馬來語 rama 的音譯，原義為父，轉稱小王。

凡此方法，《隋書》的可老羊、烏了帥、婆羅檀、低沒檀、多拔茶、烏楂等流求語，白鳥氏引證的語料擴及馬來、爪哇、巽他（Sunda）、菲律賓宿霧（Cebu）的 Bisaya、東加、古爪哇 Kawi 等語言，都屬於南島語系，或稱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Polynesian）。不論白鳥庫吉的對音研究準確度多少，流求人屬於馬來語系的說法倒與陳稜軍

---

人，……中途遇風，大船已壞，惟十四人，乘駕小船，飄流至此。」密牙古（宮古）成為《隋書》婆羅檀洞和沖繩繫連的橋樑。

<sup>38</sup> 白鳥庫吉，〈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白鳥氏對「可老羊」等語詞的考證如下。可老羊，馬來語 rāya 形容宏大、莊嚴和嚴肅的樣子，ka、an 是加強語氣的接頭語與接尾語，ka-rāya-an 即宏大、莊嚴的名詞，正與流求語「可老羊」（ka-lao-yang）對音。烏了帥，《文獻通考》作烏了帥。馬來語，頭謂 ūlū 或 hūlū，波里尼西里（Polynesia）語系中的爪哇、巽他（Sunda）、Bisaya 等方言謂頭為 ulu，東加（Togai）語謂之 olo，kawi（古爪哇）語稱酋長 ulu。《隋書》村長烏了帥當作「烏了帥」，烏了即馬來語 ulu 的對音，由頭首轉為渠帥的敬稱。馬來語及爪哇語謂國王領土為 paratuan 及 karatuan, ratu 者，國王也，pa 與 an 分別為字頭字尾；《隋書》地名的波羅檀即 paratuan 的對音，小王 rama 或 rema，其領地即 pa-rama-an, r、d 對轉，省字頭 pa, rema rama 乃轉為 dema dama，即「低沒」之音譯。低沒檀者，即 dema-an 馬來語土地謂之 tānah，相當於漢語的「檀」。至於所謂王妻稱作「多拔茶」，即馬來語的 tuwan，不分男女的敬語。「島楂」當改作「烏楂」，馬來語謂兒子為 putra，流求語王子曰「烏楂」是通稱，不是私名。

隊中的岷嶺人「頗解其語」比較符合，所以也成為台灣論者如和田清可資立論的重要依據。

然而即使同屬台灣論，早於白鳥氏的伊能嘉矩就根據這幾個流求語彙，試圖從近代所知台灣中部的巴宰族（Pazih）語找對音，巴宰語固然是南島語系之一支，因而推測流求國在今台灣中部。<sup>39</sup>伊能氏認為「歡斯」即 Kaishi 之音譯，巴宰族的家名；「渴刺兜」，男子之名的慣用語 Harato 也；「島槌」，亦男子之名之慣稱 Taut；「可老羊」，擁有神聖地位之祭司頭目 Karaohu；「多拔茶」，即 Taatah，部落老女之尊稱。地名「波羅檀」，對音是 Paradam，據巴宰族傳說，葫蘆墩街東方二公里多的觀音山麓有稱作 Haradam 的小丘，是族祖初建部落之地。Paradam 音轉作 Haradan，又訛作 Haluton，即漢人的葫蘆墩也。「低沒檀」，巴宰族謂大甲溪為 Tomel，音近之。鳥了帥，巴宰族番社包有一團壯丁的社會組織謂之 Lakelakehal，可能音轉為 Liau-liau，近乎閩南語的「鳥了」。

嚴謹的語言學家採用音轉往往特別慎重，轉多了，無不可通，遂肆己意，而如白鳥氏改「鳥」為「烏」以對音，伊能氏既引巴宰語，難通之處連近代閩南話也跑出來了，皆易流於臆說。他們的歧異也提醒我們語言學方法的脆弱性，何況據我所知，當今南島語言專家而且研究巴宰語的學者並沒有接受伊能的推測。<sup>40</sup>

<sup>39</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 15-19。

<sup>40</sup> 南島語言學家李壬癸和土田滋（Shigeru Tsuchida）合編《巴宰語詞典》（*Pazih Dictionary*）（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1），未收錄伊能嘉矩認定的語料，連 Introduction 也未觸及這個問題，我曾詢問李先生，他並不接受伊能的推測。

「流求」研究，語言學之外還有民族學方法，發端也很早。十九世紀後期，希格勒（Schlegel）反駁德理文（de Saint-Denys），其〈古琉球國考證〉就有很大篇幅論述《隋書》流求國的「人種誌」，分王居及民居、奇特的門鏤樹、政治、衣飾、兵器、戰爭、學術及宗教、外貌風俗及習慣，喪事、鹽酢酒和動物等項目，取十七和十九世紀歐洲人士所記載台灣原住民的民族學、民俗學資料，以資比較互證，而歸結為流求即是台灣。<sup>41</sup>

《隋書》流求國備述其國之地景，政治組織、武器爭戰、刑罰審判、衣冠佩飾、體質特徵、生活日用、農作家畜、婚喪禮俗和宗教信仰等，稱得上是一篇民族誌。隋帝國從公元 706 到 710 四年之內，三度侵入流求國，並且俘虜不少人口，應有足夠的資料撰寫民族誌，唯難以斷言其真實程度。

流求國的農作生產工具是石刀，所謂「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1930 年代有的台灣論者遂根據當時的考古知識而謂適合於台灣，不適用於琉球，因為琉球早有開元通寶之流通，已脫離石器時代。<sup>42</sup>估且不以晚近的台灣考古資料來質疑，單看《隋書》「有刀、矟、弓、箭、劍鍔之屬，」武器不已進入金屬時代乎？

琉球論以及台琉混同論都沒有遺漏民族學方法，前者如秋山謙藏，後者如中馬庚，但和語言分析一般，同樣方法卻獲得不同結論。

<sup>41</sup> Gustave Schlegel,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s Chinois- Lieou-Kieou- Kouo”及希格勒著，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商務印書館，1928），頁 167-181。

<sup>42</sup> 甲野勇，〈隋書「流求國傳」の古民族學的考究（豫報）〉，《民族學研究》第 3 卷第 4 號（1937 年 10 月）。

秋山氏從明代陳侃《使琉球錄》、十五世紀韓國《海東諸國紀》以及《李朝實錄》關於琉球的記載，尋找可以印證《隋書》流求國的民族、民俗資料。傳統民族誌往往流於寬鬆，比較方法容易取決於作者意向，琉球論者對《隋書》與後世沖繩紀錄的差異之處，往往歸諸時代變化造成的效果。<sup>43</sup>這種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

誠如上文提到明代的琉球記事往往雜糅《隋書》流求和當代的琉球，以致野蠻與文明熔於一爐，中國使節如陳侃就批評過去諸書「非實事」，「亦傳者之妄」，編撰《西洋朝貢典錄》的黃省曾也說「前史多不足信。」不過新井白石對文野共存的矛盾另有見解，他說：「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豈能得無訛謬於其間哉！」根據日本國史，考之於隋及歷代書，他發現「古之遺風餘俗猶存於今者，亦不少矣。」（《南島志·總序》）他的邏輯很適合後世琉球論的思辨模式，七百年前的「流求」自然猶「野」，七百年後的琉球於是乎「文」，後世底層社會的民俗，不妨當作「古之遺風餘俗猶存於今者，」琉球論自然無往而不利。

另一派的中馬庚比較《隋書》和《南島志》、《沖繩志》，發現司法科決、歲時文字、面貌體型、父子君臣、髮飾刺青、男女生育、飲食樂舞等項目，琉球和台灣多存有共相，唯喪葬有異，野獸家畜亦不同。<sup>44</sup>混同論者想在民族誌中「發現」台灣與琉球的相似性，其實《隋書》流求國的民風與文化，在南島語族中亦相當普遍。

<sup>43</sup> 秋山謙藏，〈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

<sup>44</sup> 中馬庚，〈臺灣と琉球との混同に付て〉。

〈東夷傳〉說流求國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長相類似西北塞外人種，但如果參照《隋書·南蠻傳》林邑國，亦云：「其人深目高鼻」，也應該屬於南蠻的大範疇。那麼，流求國就是台灣嗎？〈東夷傳〉敘述其國之社會文化和生活禮俗，如食用手指，世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俟草木枯萎以爲年歲，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鬚髮體毛，婦人黥手，綴鑰施鉤，懸珠於頸，男女相悅便可匹偶，銜杯共飲，歌呼踢蹄，一人唱，眾人和，王居所聚觸體。凡此記載與一千年後，即十七、十八世紀，西洋和中國的外來者對台灣平埔族群之記錄，頗有相似之處，雖可作爲「台灣論」主張的有力證據，但這些記載也多是南島語族的共同文化現象，非台灣原住民所獨有。

然而他們的政治組織依照《隋書》則有一定的複雜度，頗具文明。行政體系分爲王、小王和鳥了帥三個階級，王統治全國，小王領有洞，一國分四、五洞，洞以下有村，村有鳥了帥。王和小王出行具儀仗，「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流求國王的衛隊只有數十人，在習於帝國威儀的中國人眼中，實在其器亦小哉！不過小王連這個排場也沒有，下一級的村落頭目鳥了帥出門不可能乘机。無論如何，多少還是具有階層制的差別待遇，與千年之後外人來台所見無階級之原始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司法方面，「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頗爲複雜的審訊程序，完全超出十七世紀荷蘭人、西班牙人和中國人的知見。台灣社會歷經過從文明到原始的退化過程嗎？

《隋書》所見階層制，台灣論者幣原坦以恒春半島的瑤嶠族具有

進步的文化來比附，<sup>45</sup>究其根據，不外是十七世紀荷蘭人的片面觀察。《熱蘭遮城日誌》1636年5月15日條，士官Cristoffel從瑣嶠回到大員，報告說：

(瑣嶠)這個民族，就像外表所顯示的，在交往中，他們比鄰近村莊的人文明很多，膚色比較白，個子也比較小。他們的首領對屬下也比較權威，上述 Lamlock 的兄弟一個人統治十六個村莊，每個村莊由他指派一個頭領。他有很多僕人服侍，那些僕人一直在他周圍，他們也不跟那些黑人一樣裸體走路，穿著衣服，女人甚至於遮著胸乳。妓女和姦淫被他們視為非常可恥的事情，每一個人只能娶一個妻子。如果首領去世，就由長子繼承，同受尊重。<sup>46</sup>

這個統治十六村莊的瑣嶠首領可比《隋書》流求國王嗎？可以當作「琉球之餘種」的證詞嗎？

《隋書》流求是今之台灣，還是沖繩（琉球），或者兼而有之？從文化、語言而論，都有符合與不符合之處，已如前述。我們可以憑藉的歷史事件和海路里程，唯一標識地點者只有高華嶼和包龜嶼，由於和這兩個島嶼可以印證的有效史料幾近於零，向來的地理考證多屬臆測，南北懸殊甚大。那麼主張台灣論的和田清以高華嶼即南澳島，包龜嶼在澎湖，而琉球論的梁嘉彬則以包龜嶼為久米島，高華嶼為基隆外海的彭佳嶼或棉花嶼或花瓶嶼，他們都想符應史書所記一日、二

<sup>45</sup> 幣原坦，〈琉球・臺灣混同論争の批判〉，收入《南方文化の建設へ》，頁57-58。

<sup>46</sup> 江樹聲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臺南市政府，1999），頁237。

日之水程而坐實台灣或沖繩，然而也都不是確切合理的推論。<sup>47</sup>

## 六、海上貿易之鄉？還是蠻荒食人之地？

流求國經過隋帝國無理的劫掠後，《隋書》云：「自爾遂絕」，唐宋兩朝不再進入中國的歷史舞台。唐時的記敘，杜佑《通典》只抄襲《隋書》，沒有增加新資訊。

官書即使闕如，民間仍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傳達當時的認識，唯可供分析的資料往往文藝趣味重，失之於籠統。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韓愈和柳宗元的朋友鄭權出任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卷 162 本傳）他們寫的贈行文章都提到「流求」。韓愈〈送鄭尚書序〉云：「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全唐文》卷 556）耽浮羅（今之濟州島）以下是東海外的雜國，林邑等則屬南海，唐時這些國家與廣州的海上貿易相當發達，流求國即是其中之一。柳宗元〈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亦曰：「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全唐文》卷 580）訶陵又稱闔婆，在今爪哇中部。嶺南節度使轄下的押蕃舶使主管海外貿易，東起流求，南至爪哇，西及中亞，環海之國上百。

這個海外貿易鼎盛的流求是台灣或是沖繩？

<sup>47</sup>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梁嘉彬，〈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2 期（1958），收入《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唯美的應酬文章不易傳達精確的訊息，文學改革家韓柳尙且如此，若是駢體文，就更模糊了。日僧空海（774-835）〈爲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即是討論流求問題的日本學者經常引用的資料。空海替出使唐帝國的藤原賀能寫一封信給福州觀察使，藤原使節團當在福州登陸。書信備述海上風景之險惡云：「暴雨穿帆，戕風折柁，高波汎漢，短舟裔裔。」天災之外，還有人禍，「凱風朝扇，摧肝耽羅之狼心；北氣夕發，失膽留求之虎性。」<sup>48</sup>出使路線從京都啓程，先到九州北岸今福岡附近的太宰府，出博多灣，西行轉南，往福州。在海上，若吹南風（凱風），將飄到耽羅（濟州島）；吹北風，則飄往留求。兩地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可怕的狼虎之國。

「留求」即是流求，稍晚的日僧圓珍寫作「流求」。唐宣宗大中7年、日本文德天皇仁壽3年（853），圓珍從大宰府搭大唐商人欽良暉的船入唐求法。《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二「智證大師」條記其行程如下：<sup>49</sup>「八月九日……進發過海。時東風忽迅，舟行如飛。十三日申時，北風俄起。十四日辰時漂著流求國。」北風把船往南吹，在流求國觸礁。當時日本傳言，流求是「海中啖人之國也。」禍不單行，四方無風，帆船停滯不動，但「遙見數十人持戈（ホコヲ）徘徊岸上，」情勢至爲緊張，船主哀號，怕被流求人所食，和尚合掌默念不動明王，「俄而巽風忽發，飛帆指乾維，十五日午時，著大唐嶺南道福洲（原文如此）連江縣界。」按文王八卦方位，巽乾直線相對，

<sup>48</sup> 空海，《遍照發揮性靈集》卷五（東京：岩波書店，1965），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1。

<sup>49</sup>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二，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31卷（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30）。

巽在東南，乾在西北。巽風即東南風，風起，船乃航向西北，所謂直「指乾維」，一日夜之後抵達福州府的連江縣界。這個流求不正是台灣嗎？然而食人國流求與海外貿易盛行的流求，這兩幅歷史圖像顯然難以並存。

北宋李復「與喬叔彥通判書」提及他見過張士遜（964-1049）任邵武知縣時編集的閩中異事，講到泉州東大海，無狂風巨浪時，二日至高華嶼，又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至流球國，「其國別置館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sup>50</sup>雖然張士遜是北宋名臣，真宗、仁宗朝三度拜相，但這則「異事」明顯抄了《隋書·東夷傳》「流求國」的里程，不免令人懷疑其可靠性；不過中國商人來此貿易，限居住海濱，<sup>51</sup>卻與韓愈、柳宗元所講的流求歷史圖像相通。

到南宋，關於流求的方位資訊增加了毗舍耶和澎湖。趙汝适（1170-1228）《諸蕃志》「流求國」條說，其「旁有毗舍耶、談馬顏等國。」同書「毗舍耶」條說：泉州「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可見澎湖附近有一個島，叫做毗舍耶，可以望見煙火。

成書於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的《諸蕃志》，根據曹永和的考證，<sup>52</sup>其毗舍耶資訊當來自稍早的樓鑰（d.1213）和周必大（d.1204），他們分別記述宋孝宗乾道7年（1171）毗舍耶侵襲平湖

<sup>50</sup> 李復，《潏水集》卷五（台北：商務印書館），「與喬叔彥通判」，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sup>51</sup> 鎮國時期長崎的出島，是日本限居荷蘭商旅之地，而清朝政府對付廣州外商的十三洋行，亦在城外珠江邊，皆不許與本國人雜居。

<sup>52</sup> 以下樓鑰、周必大和真德秀的記敘間引自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91、93、99。

的事件。樓鑰《攻媿集》卷八十八〈汪大猷行狀〉說：泉州「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爲島夷號毗舍耶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餘人，殲其渠帥，餘分配諸郡。」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七〈汪大猷神道碑〉同記此事，亦曰：「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帆奄至，肌體漆黑，語言不通，種植皆爲所穫。」《諸蕃志》、《文獻通考》和《宋史》所描繪毗舍耶人的原始、野蠻，大概皆根據此事的傳聞。屬於泉州府管轄的「海中大洲」平湖，一般認定即是今日的澎湖。雖然平湖發達的農作和近代以來澎湖的實況不能符合，頗令人置疑。

汪大猷「留屯水軍」防禦毗舍耶再犯，後來真德秀知泉州，於宣宗嘉定 11 年（1218）向中央申報在水澳建永寧寨，以備「毗舍耶國入寇。」真德秀〈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說：「毗舍耶國……其地闢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爲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既說毗舍耶國距離彭湖一日一夜的航程，即是清朝時代航行台澎間的路線；又說從流求國可以望見澎湖煙火，彭湖、毗舍耶、流求這三個地點如何安置在正確的地理位置呢？那麼與澎湖煙火相望的毗舍耶，捨台灣之外能去那裏找？它旁邊的流求國又該是何地？

總而言之，不論是帝國中央無端出兵侵略流求，或泉州濱海人民遭到毗舍耶劫掠騷擾，中國的確和海外蠻夷交過手，但直到元朝以前始終無法確指其地。官修《宋史》和私人著述如《文獻通考》和《島夷誌略》將流求與毗舍耶或合一，或並存，二者的關係也似有若無，

<sup>53</sup>才讓近代學者大捉迷藏。然而進入明朝，中國官方的記載就明確多了。

## 七、迷濛中逐漸浮現的琉球

明初編纂的《元史·外國列傳》有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從方位看這個「外夷最小而險」的島國顯然是台灣，明初的史官認為「漢唐以來，史所不載，」所以這篇〈瑠求傳〉便沒將過去的流求或琉球資料闡入，更不必說什麼夷州了。《元史》編纂極其倉促，多承襲元朝舊作，可以視為元人的見解。

這個瑠求國不但中國政令所不及，唐宋以來日益發展的東亞海上貿易也沒到過，《元史》「瑠求」故曰：「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元史》本傳只記兩件事，第一次發生在元世祖晚年，至元28年（1291）海舶副萬戶楊祥主動請纓，欲領兵招降瑠求。世祖加派吳志斗為禮部員外郎、阮鑒為兵部員外郎，輔助楊祥出使，交待先招諭，「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

吳志斗是書生，上書世祖說，他「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元史》「瑠求」）志斗在京城結交名流，可能有些名氣，這次出使，

<sup>53</sup> 《文獻通考·四裔考》「琉球」條：「琉球國，居海島，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宋史·外國列傳》流求國之「旁有毗舍邪國」，是何所指呢？文獻不明。而《島夷誌略》的開篇「琉球」條，其末云：「海外諸國，蓋由此始。」接著「毗舍耶」條云：「僻居海東之一隅，山平曠。」所謂「海東一隅」是以琉球作立足點嗎？亦不明。

大名鼎鼎的趙孟頫和翰林侍講學士張之翰都贈詩送行。趙孟頫《松雪齋集》卷四〈送吳禮部奉旨詣澎湖〉，明言「止戈方見武，入海不求仙」，期待他「早歸承聖渥，圖像上凌煙。」張之翰《西巖集》卷三〈送吳泉陽使琉球〉，讓我們知道志斗家泉陽，大概屬於泉州府。詩云：「吳君生長閩海曲，獨謂何足煩戈矛。九重許辨非與是，折渠不倒不肯休；朝堂諸公爲動色，一書能止百萬之貔貅。」原來在世祖決策之前，朝廷有過激烈的論辯，吳志斗一介書生，揚論廟堂，看來這位蒙古皇帝真能廣納民意。《元史》「瑠求」記載志斗主張「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此可與張詩相互印證，因而得罪了一開始就主張動武的未來長官楊祥。楊氏武人，好大喜功，耀武揚威，但元世祖最後採納吳志斗的建議，恐怕因而種下志斗日後的殺身之禍吧。

次年（1292）陰曆三月二十九日，乘南風起，元兵「自汀路尾澳舟往，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楊祥斷言是瑠求國，阮鑾不敢確定。楊祥改乘小船，抵達山下，沒登陸，派軍官劉閏領二百餘卒上岸，並且帶三嶼人陳輝當翻譯，但三嶼的語言不能溝通，元兵被殺了三人，於是逃回船上。

這支軍隊四月二日航返澎湖，楊祥逼迫吳志斗和阮鑾在給皇帝的報告寫上「已到瑠求」四字，二人不從。第二天，吳志斗卻離奇失蹤。因為吳志斗曾經指責楊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所以同袍都懷疑被楊祥謀殺。楊祥則反咬一口說：吳志斗先說瑠求不可往，今既已到達，遂畏罪潛逃。吳志斗之妻提起訴訟，元世祖下令楊祥、阮鑾回福建對質。後遇大赦，於是不了了之。

元帝國遠征軍自海上東望的長脈山丘是不是台灣？因為世祖諭降詔書提到「瑠求邇閩境，」既然起用「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的吳志斗，楊祥當從福建出兵。出發的港口叫做汀路尾澳，當今何地？學者頗為歧異，十餘位論者有六種說法。<sup>54</sup>一開始在朝廷的辯論，吳志斗建言「就彭湖發船往諭」，而獲得世祖首肯，趙孟頫詩題亦曰「奉旨詣彭湖」，出兵的港口雖無法確指，當在澎湖無疑。

從澎湖乘西南季風出航，<sup>55</sup>開船多在黎明卯時，至已時約經六個小時，望見東方的「長而低」之山，恐非今之台灣莫屬。但當時對這裡是否瑠求國則沒有共識，高級將領只有「生事要功」的楊祥堅持肯定的態度，吳志斗和阮鑑皆存疑，不願背書，可見元代中國人心目中的「瑠求」並不一定指今日台灣這個島嶼。《元史·世祖本紀》如此論斷：「(至元)二十九年，楊祥、阮鑑果不能達琉球而還，誌斗死於行，時人疑為祥所殺。」這次元軍未到達琉球。

《元史·外國列傳》「瑠求」之後有「三嶼」，曰：「三嶼國，近瑠求。」吳志斗事件後的第二年（1293），元世祖「命選人招誘之。」中書省平章政事（丞相副貳）伯顏召集群臣參議，向皇帝報告結論說：「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去年（1292）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原來中國政府所謂的招撫含有攻伐併吞的意味，三嶼國弱小

<sup>54</sup> 吳培基、賴阿蕊，〈元代汀路尾澳及琉球國考證〉，《澎湖研究·第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1）。

<sup>55</sup> 明·陳侃《使琉球錄》云從福州赴琉球，「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陰曆三月底，即陽曆四、五月，進入夏季，已開始吹南風或西南風，元兵當往東北航行，望見的應是台灣中北部的山脈。

而順從，楊祥率領的軍隊經過時，提供糧食，騰出公館給軍官住宿。上引「瑠求」條記三月二十九日自澎湖西北行，不到中午時分就看到台灣，軍官劉閏登岸，被原住民攻擊退回船上，史書接著記載「四月二日，至彭湖，」中間這兩三天，根據副宰相伯顏的無心史料，我們於是知道楊祥這批人是去了三嶼，過一宿折回澎湖，遂要求阮鑑、吳志斗作假報告，謊稱「已到瑠求。」回到當代的情境，三嶼必在台灣之北，其語言不屬於南島語系，不像昆崙人能與《隋書》的流求人溝通，那麼鄰近的「瑠求」不是逐漸清楚了嗎？

元帝國第二次出兵瑠求是在成宗朝，楊祥之後五年（1297），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向中央報備招伐瑠求，「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這支福建兵是到達瑠求國了，而且小有虜獲，可惜《元史》未記其進軍之方位里程，無法標定瑠求的位置。但經過上文的討論，高興所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這句話，可能想當然地認定元之瑠求即今之台灣吧。

今之沖繩的琉球和中國官方接觸，始於明太祖建國之初洪武 5 年（1372），但上文分析亦得知，民間貿易往來似乎早已存在。按照情理，一旦建立正式邦交，記載應該清楚明確，然而《大明一統志》（1461）〈外夷〉「琉球國」條，所記史事仍然將隋代的流求、元代的瑠求和明朝遣使冊封的琉球雜糅，述風俗則抄引《太平寰宇記》，而後者只是《隋書》「流求國」條的節本而已。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1520）參用了《星槎勝覽》，其增益《島夷誌略》的部分，已如上述。

史籍雜抄所暴露文明與野蠻並存的矛盾，十六世紀已有人發現，

黃省曾批評《隋書》「言琉球無馬」之誤，因為洪武年間琉球「屢貢良馬。」明帝國並且向琉球購馬，何來琉球無馬？他遂論斷「前史多不足信。」<sup>56</sup>嘉靖 12 年（1533）出使琉球的陳侃，返國後撰著《使琉球錄》一卷，特立「群書質異」，據其親身見聞，批判《大明一統志》、《瀛蟲錄》、《星槎勝覽》和《集事淵海》的謬誤，<sup>57</sup>其針對源自《隋書》者，如云貴族之妻「無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國家防衛，「道路坦夷，曾不設壘，樹棘以爲險。」王之居所「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聚體爲佳之說。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爲奇。」土產「無鏽樹，亦無胡椒硫黃」；野獸，「無熊羆豺狼虎豹。」長年以來現實之琉球和記載之流求的混淆乃獲得廓清。明末茅元儀纂輯的《武備志》（卷 236）〈占度載〉「琉球」接受《使琉球錄》而論過去諸多著述「非實事，」「傳者妄。」<sup>58</sup>

東亞海中，中國人長久以來認知模糊，大概進入十六世紀後期，沖繩和台灣才明確分離。有親身見聞，記錄才可能正確。關於琉球和台灣的權威記載，官書則到《明史稿》和《明史》才完全確立，二書的琉球皆指今之沖繩，而台灣則稱作雞籠山。以「雞籠」名台灣，可能始於明末張燮的《東西洋考》曰：「雞籠山、淡水洋在彭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而東番是「不在東西洋之數」的（卷

<sup>56</sup>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卷二「琉球國第九」，沈雲龍主編《明清史料彙編》初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sup>57</sup> 陳侃，《使琉球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台灣華文書局，1968）。

<sup>58</sup> 茅元儀，《武備志》第廿二冊（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頁 10034。

五，「東番考」)。<sup>59</sup>不過從福建出海的航線圖，雞籠所指的範圍當限於台灣北部，從南部而得的知識名作「大員」，南北通稱則曰「東番」。<sup>60</sup>中國認清台灣的知識大概晚到十七世紀初才算得上明確。1603年閩人陳第親履大員，回去寫了〈東番記〉，這可能是中國人對台灣第一部可信的民族調查報告，六十年前經方豪發掘出來，<sup>61</sup>近年已廣為台灣史讀者所熟悉。

明代確定沖繩為琉球，同時還有一個海島叫做「小琉球」。元明之際的周致中，在洪武年間纂作《異域志》，<sup>62</sup>上卷「大琉球國」和「小琉球國」並列。大琉球國「在建安之東，去海五百里，其國多山洞。各部落酋長皆稱小王，至生分，彼此不和。常入中國進貢，王子及陪臣皆入太學讀書。」周氏著書早於陳侃出使約一百五十年，明與琉球正式邦交剛剛啓動不久，難怪他認知的琉球國既有《隋書》流求的成分，也有明代琉球的事實，屬於上述雜糅混淆的著作。至於小琉球國，「與大琉球國同，其人蠶俗，少入中國，風俗與倭夷相似。」這會是今天的什麼地方？說風俗，亦屬捕風捉影之談。

<sup>59</sup> 張燮，《東西洋考》（光緒 14 年秋月長沙惜陰書局重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影印，1975），萬曆丁巳（1617）、戊午（1618）序。

<sup>60</sup>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據萬曆 44 年（1616）福建巡撫黃承玄奏疏，論斷「明季有識之士認為雞籠在北，東番在南，顯然不認為同在一個大島嶼。」（《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不過同時的張燮並不這麼區分，他的看法除稍早十五年的陳第〈東番記〉可以佐證外，稍晚七、八年荷蘭人實測的第一張台灣地圖名作「北港」（PACKAN）也可證實。參 Noordeloos 繪製，約 1625，見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 39。

<sup>61</sup> 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7 期（1956），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灣學生書局總經銷，1969）。

<sup>62</sup> 周致中，《異域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據明萬曆周履靖輯刊「夷門廣牘」本影印）；亦參陸峻嶺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萬曆初年嚴從簡《殊域周咨錄》(1583)卷四云：「《祖訓》中載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別。」他進一步說明：「小琉球不通往來，未嘗朝貢，則今之奉勅封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國也。」所謂《祖訓》當是明太祖之訓諭，那麼明初官方確定已有大小琉球之分。<sup>63</sup>小琉球和中國沒有邦交往來，未納入朝貢體系內；早於嚴從簡半世紀出使琉球的陳侃在《使琉球錄》特別分辨大小琉球之別說：「閩中士大夫常曰：『霧月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居住在省城福州的士大夫對琉球的認識依然是傳統式的，不像有出使經驗的陳侃能分別大小琉球。大好天氣時，在福州有機會望見的小琉球當是台灣北部山巔或基隆外海的島嶼，即後來所稱的雞籠或雞籠山。

大、小琉球地理位置的區分，也見於近代歐洲人製作的地圖，可以上推到十六世紀下半葉，當係他們從南洋航往日本途中之見聞和想像。日本中村拓收集此時西方人所作的東亞地圖，東中國海島鏈，南起菲律賓，北至九州，中間一系列島嶼，「大琉球」(Lequio mayor, Ileqio grande) 在北，「小琉球」(Lequio menor, Ileqio peqeno) 在南，大約相當於沖繩和台灣的位置，<sup>64</sup>只有少數地圖，沖繩標識 Lequio，

<sup>63</sup>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余思黎點校本，頁 163；並參梁嘉彬，〈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

<sup>64</sup> 中村拓，《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III (東京：東洋文庫，1967)。相關圖版參看(I) 無名氏「葡萄牙製平面世界圖」，約 1545-1548；(IV) Daniel Cellarius, “Asiae Novissima Tabvia” (東亞圖)，1578；(V) Andre Thevet, “Carte des Provinces de la Grande et Petite Asie” (亞細亞圖)，1581；(IX) Joan Martines en Messina，東亞圖，1587；(XI) Antonio de Herrera, “Descripcion de las Indias del Poniente” (東亞南洋圖)，1601；(XL) Fernão Vaz Dourado, “Nesta Folha ésta Lamcado” (東亞圖)，1571；(XLI) Fernão Vaz Dourado, “Nesta Lamina esta

台灣注記 Formosa。<sup>65</sup>然而西方人和中國人一樣，對大琉球與小琉球或福爾摩沙的分別認識亦經過由晦而明的過程，早先台灣在地圖上被畫成三個島嶼，在南者標識小琉球或琉球，在北者福爾摩沙，及至知道只一個島了，有的地圖仍標記「琉球或福爾摩沙島」(Loquio Ó Formosa I.)。<sup>66</sup>

## 八、「流求」史論的表與裏

從隋代以下，歷唐、宋、元到明初，中國與日本文獻所記載的流求、瑠求或琉球，以及其他同音字詞，到底是今日何地，一百多年來出現台灣論、琉球論和台、琉混同論三派，長年纏訟未決。本文無意介入這場筆墨官司，也不是要評述各說的得失，我關注的是歷史家在專門考證論辨之餘，或多或少流露的關懷和非學術性的考慮。在學術論著中，一般學者往往掩藏他的心境，但這方面的訊息其實與作者冠冕堂皇的論著不無關係，有可能影響史家建構的歷史圖像，也可以

Lamca”（東亞圖），1573：(XLVII) Cornelis de Judeis, “China Reg Nvm”（東亞圖），1593：(XLVIII) Cornelis Doetsz，南洋鐵路圖，1598：(LIII) Hakluyt-[Molyneaux of Lambeth-Edward Wright]，世界圖，1598-1600：(LV) Gabriel Tatton，平面世界圖，約 1600：(LVI) Pauli G. F.P.N.Merulae, “Totius Orbis Cogniti Universalis Descriptio”（兩半球世界圖），1605。

<sup>65</sup> 參中村拓前引書，(XXII) 無名氏，“Orbis Terrarum a Hydrographo Hispano”（西班牙製平面世界圖），1573：(XLVI) Joan Martines de Messina，東亞圖，1591。

<sup>66</sup> 南北分稱者參引：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頁 26 “Map of China, Cauchin china, Camboja” (1596)；頁 133 “La China” (1656)；頁 134 “The Kingdom of China” (1627)。二名合稱者參頁 30 “Il Regno China” (1682)。或者北港與福爾摩沙合稱，見頁 54 “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 (1652)。

透視建構過程中內心說不出的曲折，使它再現。

二十年前我提倡新史學，期望史家能從歷史的表層看到它的內裏。當時將歷史分作骨骼和血肉兩大部分，傳統史學重視的政治、軍事、外交、社會和學術屬於表層，新史學增益的生活禮俗、生命心態算作內裏，<sup>67</sup>頗引起一些年輕學者的興趣，這些年來台灣史學界的確獲得不小的成績。然而隨著個人的年齒日長，涉世愈深，愈發對歷史的內裏有不同的想法——內裏，深入到骨子裏，製作「歷史」的史家的骨子，也包含閱讀「歷史」者的骨子。台灣史「第一」難題的「流求」，過去參與論戰者多屬於實證史學家，即使信奉史料為先，對同樣的史料卻有天南地北的結論，原因就出在「內裏」上。

批判史學重視史料，作為一切理論、概念或觀點的基礎，百餘年來發展出精細入微的考證方法，相信只要史料可信，寫成的歷史便是真實，至少接近真實。大原則上固無可厚非。然而誠如本文開篇所說，在汗牛充棟的史料中，一個歷史家會選取某個課題的資料從事研究，便存有主客觀的機遇性；而這個課題的結論會成為多人的議題，引起廣泛的關注，同樣也須有主客觀多重條件配合，方才可能。

將中國傳統典籍的「琉球」牽連到當今的台灣，上文說過，始於法國漢學家 de Saint-Denys（德理文），其譯述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流求國之論文，出刊時間是在 1874 年。讀者或許會連想到這年日本進攻牡丹社，因為三年前，遭遇海難的琉球人被恒春半島原住民殺害。德理文寫作的緣由，個人學術思想的因素固容再考，但當時

<sup>67</sup>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第 3 卷第 4 期（1992 年 12 月），收入《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2004）。

國際大情勢之影響恐亦不能排除。他的論文中明言：福爾摩沙的重要性及其地理位置已引起密切的關注（L'importance de Formose et celle de sa position géographique m'ont paru dignes de quelque attention），又說其住民不同於中國人，引起人們對他們的國家認同和民族來源探索的興趣（donnet un intérêt particulier à l'identification de leurs nationalités et à la recherche de leurs origines）。<sup>68</sup>

近代國際情勢變化凸顯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當時法國在東亞絕不缺席，十年之後甚至掀起清法戰爭。一個對東方學術具有發言權的學者，不可能自外於時代吧？這恐怕是德理文選擇譯述《文獻通考·四裔考》「流求國」條的契機，否則漢學的領域那麼廣大多樣，何獨選取這個課題，也竟然開啓東亞史學界的長期爭論。

過去歷史的課題與當下史家的關懷分不開，即歷史的作用，中國傳統史學謂之「知人論世」。屬於台灣論的市村瓊次郎，研究唐以前的福建與台灣，雖然是針對一千多年前閩台關係的歷史進行實證「客觀」研究，他也坦言這個課題不論現在或將來，凡有志於國家之經營、議論的人，多應該注意。<sup>69</sup>

荷蘭漢學家 Schlegel（希格勒）之率先反對德理文而提出台灣論，也許是所謂「內在理路」之故，圈內同行對話本來就是學術界的傳統。希格勒說：「中國史乘中所誌諸國，最混淆不分，使中西地理學者疑莫能解者，莫逾於琉球。」真是被他說中了，雖然他的時代還看不到後來那麼熱鬧的場面。不過，此一長文有一句非關考證的「閒

<sup>68</sup>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Sur Formose et sur les îles appelées en Chinois Lieou-Kieou," p. 119, *Journal Asiatique*, Août-Septembre, 1874.

<sup>69</sup> 市村瓊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

話」所引起的關注，倒映照出所謂實證史家內心深處的奧秘。

希格勒說：「中國此種無信無理之攻擊，又何怪台灣人後來之報復耶？」（*Est-il étonnant qu'après une attaque aussi perfide et non-motivée, les Formosans exaspérés aient plus tard tiré vengeance de l'insulte que leur avait fait la Chine?*）<sup>70</sup>

通常實證史家不喜歡在學術著作抒發感慨，講題外「閒話」。然而歷史研究不管多麼強調理性或中性，一旦涉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原則（或價值判斷），歷史家該放棄價值，退讓原則嗎？隋之征伐虜獲流求國人，師出何名？這個海外島國何嘗招誰惹誰？《隋書·陳稜傳》明明記載：「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單純的流求人還以為中國兵是來做買賣的呢！然而「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不分青紅皂白就開打了。流求國主遣兵拒戰，不敵隋軍，於是國亡人虜。陳稜班師，回朝獻俘，隋煬帝將流求人「頒賜百官」當奴隸。如果唐人張鷟《朝野僉載》的記載可信，上一次朱寬出征留仇（流求）國，俘虜男女千餘人，「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這筆帳也算上去，這個所謂的禮義之邦，堪稱文明國度嗎？

希格勒不只對中國的批判，也同樣批判他自己的國家，接著批評說：「至葡萄牙（按當作西班牙）人及荷蘭人之待遇此種可憫的蠻人，

<sup>70</sup> Gustave Schlegel,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琉球國, le Pays de Leou-Kieou", p.203. 亦參：希格勒著，馮承鈞譯，〈古琉球國考證〉，《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卷十九，頁183。

其殘酷亦不在中國人之下也。」<sup>71</sup> (Le rôle joué par les Portugais et les Hollandais n's pas été plus beau que celui joué par les Chinois, et on va après vilipender ces pauvres barbares qui etaient vraiment assez payés pour avoir eu confiance en la bonne foi des races supérieures (?!)) 可憐的原住民被鄙視欺凌之餘，還相信仁慈的敵人是優越的種族呢！希格勒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民族主義史學家做得到的。

## 九、台灣論的雙面刃

民族主義史學家往往看到本民族的善而忽略其惡，希格勒固不至於此，他對隋帝國的批評，頗使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近現代中國史學家無法釋然，長年鑽研「流求」史的梁嘉彬即是最鮮明的例子。由於希格勒是台灣論的首倡者，梁氏轉而根據他的「閒話」指責台灣論者居心叵測，批判的對象尤其專門針對日本學者。他說：

主台灣說，最早係由御用學者參據歐西學說粗工製成，其後有盲從附會論，……以之強證台灣自古爲琉球與倭之別種，經隋討伐，乃幾盡墟其國者；且又以之侮蔑中國古代航海工具技術之幼稚，與夫滅人國族之慘無人道也。<sup>72</sup>

歐西學說當指希格勒。從中國古代航海技術解釋「流求」、「琉球」相關史料，日本學者大有人在，雖然梁氏認爲他可以通釋琉球論；其

<sup>71</sup> 同上注，馮承鈞譯文不全，茲依文義補之。

<sup>72</sup> 梁嘉彬，〈流求辨：敬質「隋代流求爲臺灣」之論者〉，《中央日報·學人》第67期（1958年1月21日），收入《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199。

實邏輯上，由於航海牽涉風力與潮流，史籍所記日數而估算的里程並不絕對，不論中國古代航海技術先進或落伍，都不是可以甄別「流求」今地的有效方去。至於滅人國族的罪行，正史記載明白具在，除非能辨證史料不實，否則無所謂「強證」的主觀性問題。

這位實證史家之反對流求即台灣之論，當與他說的「我漢族之於台灣，實只有開化之恩，全無滅絕之怨」<sup>73</sup>的基本假設有關吧。真不愧是實證史家！他既無法否定《隋書》，不敢斷然不理會隋軍對流求人的蠻橫暴行，於是就非加倍努力論證「流求即沖繩」不可了，這可以理解為中國之琉球論者的「微言」吧。我們似乎看到實證史學表層的科學性，和史家作為國家民族之一員、在特定時空情境下的內心傾向，以及二者互動的微妙關係。

一種理論，或一個概念，不論形成的過程如何中性客觀，在不同的時代或地區，經由不同人轉手運用，往往會產生兩極化的效果。這種歧異在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形成以後的近現代特別明顯，所以「流求即是台灣」這個命題，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從中國與台灣很早就有關連，跳躍到「台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論調，以至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史觀仍然倡言隋煬帝、甚至三國孫權時，中國人早就到過台灣，非把這個尚存爭議的「歷史」寫入教科書，作為真實歷史不可。但同樣的史料，梁嘉彬則苦口婆心勸人放棄台灣論，因為他深怕持此論者，「以愛台灣之心而反有貽害於台灣也。」<sup>74</sup>

梁氏何以斷言台灣論會產生愛之反而害之的後果呢？因為他了

<sup>73</sup>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00。

<sup>74</sup>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05。

解所謂日本「御用學者」的台灣論。日治中期，鈴村讓受台灣總督府之委託，彙集多種台灣方誌編輯《臺灣全誌》（1922），其卷首〈例言〉云：

台灣古稱琉球，隋伐之，……《唐書》則為多尼，《日本書紀》總稱沖繩以南列島為多禰，後改南嶼。持統帝時（686-697）遣文忌寸等求蠻所居，文武帝時（697-707）又遣文忌寸等覓國，因給戎器，而其翼年，信覺（原注：訓志賀岐）、度感（原注：訓太古）等來貢。信覺者，石垣島也；度感與多尼音近。如呼此嶼者，智證之為咬人國，空海之為虎性，《狹衣日記》之為宇留麻國者，蓋皆台灣也。<sup>75</sup>

這段文字頗取材於新井白石的《南島志》（1719），時值十八世紀初，還沒有台灣割讓日本殖民的事，貼不上「御用」的標籤。當然兩百多年後的歷史情境完全不同，按照鈴村氏鉤勒的歷史圖像，日本殖民者倒也可以學北京的口吻說，「台灣是日本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從梁嘉彬的眼光看，戰後台灣力主將隋之流求和三國之夷州寫入台灣史的人，也算台灣論者，不過徒逞意識型態，少有深厚的學識可言，甚至他們根本不曉得日本台灣論者的居心。

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不止《隋書》流求國是今之台灣，《三國志·吳主傳》的夷州也是台灣。黃龍2年（230），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

<sup>75</sup> 鈴村讓主編，《臺灣全誌》第一本（台灣經世新報社，1922），〈例言〉。

不還。……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而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不過吳國也付上沉重代價，「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三國志·全琮傳》）萬人甲士死去十之八九，剩下一兩千人，卻能俘虜數千人，不無令人起疑。

吳軍所到的夷州，同時代的沈瑩撰有《臨海水土異物志》，今只剩部分文字收入《太平御覽》（卷 780），可以略窺夷州人的社會和文化。《隋書》流求國已夠模糊了，《臨海水土異物志》的夷州更甚，其文化的描述更籠統，又完全缺乏行軍路線和里程的紀錄，但中國學者幾乎毫無異議地咬定三國的夷州即是台灣，並且說：「這是中國政府的勢力第一次達到台灣，其歷史意義是十分深遠的。」<sup>76</sup>因為此說如果成立，中國軍隊之入侵台灣將比隋煬帝提早二百八十年，中國政府更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示「台灣自古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當今學風，一旦牽涉到國家領土之主權，潔身自好的史學家都想撇清，深怕現實政治污染了他的「純淨」學術，尤其是相信史料會忠實呈現歷史的實證派學者，更具潔癖。梁嘉彬既以實證自負，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明，他是「從純學術立場」論辯，堅持「私慾偏見應屈服於學術真理。」<sup>77</sup>然而「流求該當何處」這個問題之所以不得不辯，他相信「關係台灣省史之真偽純雜，琉球國史之存亡補削，以及東洋各國史之本來面目甚鉅。」言外之意，頗有孟子「予豈好辯哉！」

<sup>76</sup> 張崇根，〈一部記載有臺灣歷史的最早著作〉，《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代自序（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輯校者張崇根連繫《臨海水土異物志》和清人關於台灣土番的記錄，夷州語人民稱作「彌鱗」，他說即是《諸羅縣志》等的「貓鄰」，「其含義均指已成丁的青年。」其論斷大有問題，本文不詳述。

<sup>77</sup> 梁嘉彬，〈從純學術立場論隋書流求答臺灣論者〉，《中央日報·學人》第 91 期（1958.8.5），收入《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 207。

予不得已也」的苦衷。

上世紀五〇年代初，日人國分直一評述戰後台灣的歷史學與民族學界，說到梁嘉彬的琉球論述，懷疑其動機呼應中國方面的要求，給人並不純粹的印象。<sup>78</sup>此時琉球在聯合國託管、美軍佔領、主權尚未明確所屬的情況下，同屬實證派的國分氏之質疑，似乎反應他也考慮到學術表層之下，還存有其他的複雜因素。但揭舉純學術大旗的梁嘉彬則嚴正聲明，國分誤解他，「謂余著作動機係要求琉球主權，實是冤枉，蓋余已屢言討伐關係不能構成主權之歸屬也。」<sup>79</sup>梁氏的意思，現代主張隋煬帝派兵攻打沖繩，不意味中國對沖繩擁有主權，他不是要追溯琉球作為明、清附庸國的歷史，也絕無意圖否定二戰後聯合國對沖繩的處置。

梁嘉彬討伐無關主權歸屬的看法，正確無誤。試想，無理無由出兵征服別國，俘虜人口，掠奪物資，已為文明世界所不容，怎可能藉無名之師的侵略反而宣示擁有當地的主權呢？這是什麼樣的道德標準！如果積非成是，將會淪為什麼樣的世界秩序！

堅持琉球論的梁嘉彬，既然不存中國擁有琉球主權的念頭，在意識層次，日本的台灣論者（至少一部分）是否相對的也不是他口中的「御用學者」呢？台灣論的健將，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和田清也是梁氏的業師，自述其研究動機說：「琉球、台灣皆是邊境外的小土，實際上長久以來被忽視，學界亦然，國史家和東洋史家都忘卻她們，遂不得究明真相。」所以台灣論雖然早經希格勒提出，他仍覺得有必要利

<sup>78</sup> 國分直一，〈戰後臺灣に於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11卷第2號（1951）。

<sup>79</sup>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00。

用多方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sup>80</sup>然而就這麼「純學術」而已嗎？

當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之際，琉球論或台灣論筆戰方殷時，琉球論主將秋山謙藏發表〈流求即臺灣說成立的過程〉，<sup>81</sup>提供我們觀察實證研究內裏的面目。這是一篇疏理日本東洋史學的文字，尤其以台灣、琉球、朝鮮、滿洲的研究為核心。他說，明治維新以後，由於日清和日露兩次戰役，前者使日本領有台灣，後者則從俄羅斯繼承南滿的權益，開啓日本帝國北進和南下的戰略。由於國家資本的投入，社會作為奧援，滿蒙朝鮮的調查和歷史地理研究急速發展；台灣完成土地、人口調查，歷史研究卻相對不振。透過台灣總督府的資助，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發行的《東洋學報》和《史學雜誌》遂出現一系列夷州、流求的論述。秋山言外之意似乎指責台灣論也給人不那麼純粹的感覺吧。

台灣的實證史家又如何？承繼日本史學傳統的曹永和即屬於台灣論者。曹氏秉承嚴謹學風，六〇年代發表早期台灣史的長文，「自散見於各書的零文短語，多方推求，虛心考究，」幾乎網羅可能與台灣早期歷史有關的文獻史料，希望藉此「獲知吾先民之活動情形的大概。」<sup>82</sup>這是「台灣島史觀」形成前的曹永和，實證史家的史觀必然具備堅實的史料基礎；然而和日本的台灣論者一樣，難脫大時代的氛圍，在戒嚴體制下，曹氏的研究可能容許違反國策或當局意識型態嗎？

<sup>80</sup>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

<sup>81</sup> 秋山謙藏，〈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関する第二論〉。

<sup>82</sup>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第3期（1963年4月），收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73-74。

## 十、一個實證史家的焦慮

這位焦慮的史家就是上文多處涉及的梁嘉彬，大半輩子投入「流求」史研究。他為「流求」應該是台灣或是琉球而焦慮，也為他所信奉的純學術而焦慮。他認為「流求」是琉球，絕非台灣，四處與人打筆仗，並且一再指責他人的立論別有居心，他才是純粹為學術而奮鬥。在「反共抗俄」、「反攻大陸」高唱雲霄的時代，他察覺台灣論者「著作動機至為複雜」，不外要消滅琉球國之原史，「把台灣化為自古與中國分庭抗禮的獨立島國。」<sup>83</sup>我們似乎感受到他充斥著迫不及待的焦慮。

與上世紀二〇、三〇年代北大、清華的高材生一樣，梁嘉彬就讀清華大學史學系時就撰著《廣東十三行考》，蜚聲學林；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東洋史學科，受業於和田清門下，二戰後東京大學頒贈給他舊式的博士學位。不論清華或東大，當時都承繼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嚴辨史料的學風，屬於典型的實證史學。1947年梁嘉彬發表〈琉球史論正謬〉，首次提出「流求」琉球論，一反日本主流的台灣論或琉台混同論，主張《隋書》的流求即今日稱作沖繩的琉球，不是台灣，也不是包含二者的「南島」。爾後二十幾年，梁嘉彬廣泛搜羅各類史料，撰寫學術期刊專業論文和報章

<sup>83</sup> 梁嘉彬，〈論「隋書流求為臺灣說」的虛構過程及其影響：兼論東吳夷州為琉球〉，《東海學報》第1卷第1期（1959）。收入《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通俗或半通俗文字，總計超過三十篇，<sup>84</sup>從不同角度伸張他的琉球論。

其實台灣論、琉球論，或者混同論，同一個「流求」卻建構成不同的圖像。梁嘉彬自述他的研究是「將琉球歷史還之於琉球，台灣歷史還之於台灣，」<sup>85</sup>我們是否也可以借用他的話加諸不同派別者身上，他們又何嘗不是要「還原」他們認為的琉球史圖像和台灣史圖像？

戰後梁嘉彬來台，不像他的胞兄——另一位傑出史學家梁方仲，留在中國。堅持實證史學的梁嘉彬，身在台灣戒嚴法管制之下，否定流求即台灣之論，與當道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明顯抵觸。還好，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麼「活學活用」歷史，只要你不涉入現實政治，討論一千多年前的流求問題，尚不致於有立即可見的危險。何況梁氏具有相當的國際聲望，多增一張保護傘，不過，他的内心依然充滿困擾。

1972 年梁嘉彬發表〈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連同另一篇諸蕃志流求國逐句考證，<sup>86</sup>合為他生前對流求問題的最後學術著作，上距始初的〈正謬〉，整整二十五年。在這篇六萬多言的專業考證文字中，作者不時將內心的煎熬和焦慮表露在文字上。

不只日本人主張台灣論，中華民國教育部審定的標準教科書也主

<sup>84</sup> 梁氏流求及其相關主要論述，1965 年以前者結集成《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一書。其論著詳目請參看黃啓臣、梁承鄴編著，《梁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十三行之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 118-124。按此書收集的論文目錄猶有遺漏。

<sup>85</sup> 梁嘉彬，〈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收入《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 321。

<sup>86</sup> 《隋書》考證之文發表於《大陸雜誌》第 45 卷第 6 期（1972）；〈宋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國考證：兼考宋前、宋後琉球及臺灣澎湖諸島〉。上引黃啓臣、梁承鄴編著《梁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十三行之一》（梁嘉彬傳略），論著目錄漏收。

張台灣論，梁嘉彬簡直無法忍受了，他批評教育部「誤以爲此乃有含台灣與大陸連鎖之一最佳說法，」何其愚蠢也！梁氏指責標準教科書不理會他的琉球論，反而採用曾經是敵國的學說。他「三十年來，聲嘶力竭，反對盲從。」都是史學正宗的考證，有堅強的史料基礎，「非欲爲感情之發洩，或政治之利用。」發表的相關著述六十萬言之多，其目的「只欲以台灣省史歸諸台灣，琉球國史歸諸琉球，爲學術而爭，爲真理而戰而已。」學術研究提高到爲真理而戰的層次，堪稱悲壯！梁氏「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慷慨激昂的態度，能說既「不預存成見」，也不「摻雜感情」嗎？這樣獲得的結論可能是「真理」嗎？

梁嘉彬痛惜「中國人蓋無真心實意研究海島史地者」，對日本學者的論著「只有無條件接受」在他看來，歐洲和日本的流求台灣論之動機，「不外好奇立異，欲創爲新說，又或別存政治因素。國內時賢著作又或通史教科書，但求追隨外人理論，其意以爲可藉此爲伸展台灣省史之地，而於不知不覺中已代外人強證中國必曾滅人之國，墟人之地，以致台灣土族文化，宋元不如隋唐，明清不如宋元。」原來他還是不願面對中國有滅人國、墟人地的歷史，原來他怕一旦坐實《隋書》流求是台灣，當今原住民文化之落後是因爲曾遭中國人重創，他們的倒退便是中國人的責任了！這樣的考慮不知有沒有違背批判史學的原則？其實他更擔心「台灣省史與中國國史自古分立，或自古爲琉球一部分。」這樣的歷史圖像一旦定型，便可爲台灣地位未定論找到歷史依據，爲台灣的獨立或歸屬於日本之論張目！他的考慮不能說不深遠，我們能說他不帶有國家主權的考量嗎？

不過梁嘉彬仍然一口咬定主張台灣論或琉球台灣混同論的人，

一面抹殺清代開化台灣土族之恩，一面妄（原文誤作「忘」）證捏做華人屠殺台灣土族之怨，又欲妄製琉球自古代為日本屬島之說，不許琉球自有其歷史之存在。台灣自古為琉球殖民地之說，使之台灣於（與？）日本亦有其間接連鎖關係。

琉台混同論一般把沖繩到台灣廣大範圍內皆屬於《隋書》流求國，另一種說法是台灣極南端的原住民瑤嶠族係沖繩之殖民者，總之是琉球台灣一體。而琉球早已併入日本領土，此一論述豈不是為日本之領有台灣找到古史的「王道」根據，而不像馬關條約的「霸道」？

日本學者「純出自政治動機」猶或可說，最令梁氏氣短者，一般中國人竟然不能辨別琉球台灣兩地古俗之差異，而「為虎作倀之徒曾或不以我為德，而反以我為仇！」德、仇云云，語意涵蓄而保留，他似乎被打過小報告，受過干擾嗎？

## 十一、台灣歷史圖像的聯想

「流求」這個小小案例，教育我們真實歷史的追求有多難！史家不但背負著學術圈內在傳統的包袱，受到所在時空潮流的種種壓力，還要時刻檢查與自己共存的時代意識，凡此層層關卡都是通往「真實」的障礙。一個嚴肅的學者應該承認他提供的只是一種「歷史圖像」，不敢奢談真實的歷史。

本文主旨涉及兩個層面，一是歷史研究達到構成圖像的層次，多

受寫作歷史者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影響，於是字面看到的「歷史」故事之餘，其實在字裡行間還藏著史家的内心世界。

其次，這個歷史學的本質性課題，台灣史蘊藏問題的深邃不在其他歷史之下，我們所知道的「台灣史」其實呈現多種的圖像（也就是不同的故事，甚至同一故事不同說法），而這些圖像建構的過程和隱微的奧秘，將隨著研究的深化而一一現形。

歷史之構成，是在時間長河的過程中，某地之人或某些人在某地所呈現之具體事物和抽象思想。如果台灣史研究採取「屬地主義」，涵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會有過的種種人，所發生的種種事，那麼公元1603年陳第寫的〈東番記〉，當是外人對台灣平埔族最早直接觀察所作的紀錄。二十多年後，荷蘭傳教士甘治士（Rev. George Candidius）也對同一主題作了記載。早期台灣這塊土地主人的圖像，在這兩份原始記錄所呈現的異同，透露什麼歷史信息，是值得考察的。

台灣的統治者站在統治的立場觀察台灣，形成一套論述，當推始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末任台灣長官揆一（C.E.S., Frederick Coyett）為洗刷自己清白而寫作的《被遺誤的臺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 1675）。而後官編史書都反映統治者所看到或關注的台灣歷史世界，他們的記載雖然符合部分事實，卻無法避免主觀立場的偏頗。過去官方主流論述大概都脫離不了這個窠臼，明鄭、清帝國、日本以及民國皆然，加以比較，當可發現台灣的歷史圖像有若敦煌壁畫，隨著時代變化，一層覆蓋一層。我們現在要想了解台灣歷史，只好逆向而行，把歷代的圖像一層層掀開。

荷蘭時期 François Valentijn 的《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en*) 已有關於福爾摩沙的地誌記載，清帝國治台，尤其在前期，密集地編撰地方志，可見方志當有助於統治，所以前近代台灣史的官方論述以地方志為大宗。官修方志有既定的規範，其體例往往透露統治者對台灣興趣之所在，顯示一定的成見，但究竟為後世保存一些史料，反映台灣的「歷史」，如果把不同時期纂修的方志綜合起來，將可提供我們對台灣歷史的某種認識。

歷史是什麼（What）固然重要，誰人（Who）的歷史同樣重要。這個「誰人」可以包含「寫誰」和「誰寫」，二者往往頗有關連。被寫入台灣史的「誰人」應該包含先住的南島民族以及後來移入的漢人，這兩大民族的互動消長構成四百年台灣史之前面三百年，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和《臺灣蕃政志》交織成這部曲折的史詩。相對於連橫的《臺灣通史》，伊能視野遠為寬廣，能夠看到台灣歷史較全的面貌。而連氏以漢人墾拓作為台灣歷史的主軸，予以神聖化，雖反映他的歷史觀，但符合現代台灣人的價值觀嗎？

歷史書寫雖然沒人敢說絕對公正客觀，但相對性是絕對存在的，至少像耶穌會士馮秉正（Father de Mailla）十八世紀初期對台灣的記述，比較平埔族和漢人的道德，應該是不涉及自身利害的觀察吧。十九世紀來台的西方旅行者、探險家，雖然被中國民族主義者貼上帝國主義的標籤，他們筆下的台灣難道比中國統治者的記述更遠離事實嗎？這些來台久暫不一的觀察，拼湊成的歷史圖像，是否真的如「風中之葉」（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彙編的《福爾摩沙見聞錄》），體現台灣不由自主的歷史命運？

近現代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論述，是十九世紀末的西洋人啓動

的，始創作「台灣島史」的概念，和過去地方志作為帝國體系之一環截然不同。二十多年後，台灣人撰寫的《通史》問世，謂之「通史」，具有多少主體意識姑且不論，就歷史內涵分析，西方人的視野能否照映出這部所謂台灣史「經典」的局限性？

台灣歷史種種圖像中，有一種政治流亡者所建構的台灣史，最具代表性的是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和王育德的《臺灣：苦悶的歷史》，他們看到的歷史世界不僅與統治者不同，和被統治的台灣人也有或大或小的距離。流亡史學家的台灣歷史圖像，在世界歷史中恐怕是比較罕見的吧，學院派的正統史學應該如何理解與對待？

每個人都在成長過程中逐漸認識現在與過去，逐漸形成個人的世界觀與歷史觀，除非經驗或研究，所謂自己的世界觀、歷史觀以至於什麼觀，其實都是別人餵給你的。明白這個道理，你才可能成為具備獨立判斷能力的明白人。這是國民的基本教育，生存在所謂「多元」的時代，一個單薄的個人不能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

前賢或近人的台灣史著述，包含大故事或是小專題，不同時代與不同政權下的產物，不同國籍與不同立場的作者，唯有透過比較的檢驗，我們的歷史認識才可能比較全面。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歷史學的根本課題——歷史，是誰的歷史？當你思考個人的、國家的、以至於世界的問題時，你所掌握的「歷史」可以作為你思維的「資料庫」嗎？